

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

全汉赋

评注

龚克昌等

评注



花山文藝出版社

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

全汉赋评注

龚克昌等
评注

I222.4/15

RBB83/11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全汉赋评注/龚克昌等评注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3

ISBN 7-80673-308-6

I. 全… II. 龚… III. ①汉赋-汉赋集②汉赋-注释 IV. I22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3647 号

书 名: 全汉赋评注

评 注 者: 龚克昌等

责任编辑: 宁宣成 刘桂欣

美术编辑: 宋丕胜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点睛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-mail: hswycbs@heinfo.net

印 刷: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1016 千字

印 张: 45.625

印 数: 1—1000

版 次: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673-308-6/I·187

定 价: 75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序 言

一

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，祖国大陆的赋学研究有如雨后春笋般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，并迅即与香港、台湾连成一片，先后在山东、香港、台湾、南京、漳州召开了五次国际赋学研讨会；在长沙、成都召开了两次全国赋学研讨会。从事赋学研究的人员由原来的少数几个发展到上百人，出版辞赋专著百余种，发表辞赋论文千余篇，并培养了一大批辞赋硕士生和辞赋博士生。今年夏天，又在大连举行全国赋学会的常务理事会，对今后赋学研究的前景作了令人鼓舞的安排。

通过三十多年的研究，我越发感到汉赋在中国文学

史上的巨大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地位。清人焦循在其《易余龠录》卷十五里说：“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……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，汉则专取其赋，魏、晋、六朝（按当系南北朝之误——引者）至隋，则专录其五言诗，唐则专录其律诗，宋专录其词，元专录其曲，明专录其八股，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。”近人王国维对此稍加删改，但汉赋的地位依然高居其中，他在《宋元戏曲考·序》里说：“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，楚之骚，汉之赋，六朝之骈语，唐之诗，宋之词，元之曲，皆所谓一代之文学，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。”我以为，汉赋或许没有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那么辉煌，但它确是“一代之文学”，她真实地表现了大汉帝国的气势，传达了大汉帝国的精神面貌，她是我国古代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，她为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繁荣积累了经验，创造了丰富多采的艺术表现手法。

二

汉赋是适应着汉初新的时代形势发展起来的。汉赋在两汉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高峰，其一是在武宣之世，其二是在灵帝之时。武宣的贡献尤大。班固

在《两都赋·序》里说：“或曰：赋者，古诗之流也。昔成康没而颂声寝，王泽竭而诗不作。大汉初定，日不暇给。至于武、宣之世，乃崇礼官，考文章，内设金马石渠之署，外兴乐府协律之事，以兴废继绝，润色鸿业。……故言语侍从之臣，若司马相如、虞丘寿王、东方朔、枚皋、王褒、刘向之属，朝夕论思，日月献纳；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、太常孔臧、太中大夫董仲舒、宗正刘德、太子太傅萧望之等，时时间作。……故孝成之世，论而录之，盖奏御者千有余篇，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。”班固这段话，讲了赋的属性，赋的兴衰与时代的关系，赋的作用；但着重讲了赋的创作在汉代的盛况。西汉初期，由于社会不安定，经济也有待恢复与发展，人们尚无暇顾及艺文。到了武帝时，“汉兴七十余年之间，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给家足，都鄙廩庾皆满，而府库余货财。”（《史记·平准书》）由于社会的安定，经济的繁荣，国家的强盛，汉赋的创作才因时趋势而迅速发展起来，当时不仅文人学士作赋，公卿大臣作赋，帝王亲自作赋，连地方官吏、行伍将领、年轻学子也作赋。如御史大夫（汉“三公”之一）倪宽有赋两篇，太常（汉“九卿”之一）蓼侯孔臧有赋二十篇，淮南王有赋八十三篇，阳丘侯刘鄩有赋十

九篇，汉武帝有赋二篇，河内太守徐明有赋三篇，左冯翊史路恭有赋八篇，骠骑将军朱宇有赋三篇，博士弟子杜参有赋二篇。真是上至帝王将相，下到一般生员学子，大家都竞相写赋；而且是“朝夕论思”、“时时间作”，不停地谋篇，不断地写作，所以到西汉后期汉成帝时，仅“奏御”——献给皇帝之赋就“千有余首”。未“奏御”的有多少呢？成帝以后又写了多少？班固有的不了解，有的在他身后，但从扬雄——他是西汉后期重要人物——曾经那么醉心于作赋以讽谏，相信当时社会上写赋的热潮并未消退。

东汉的情况又是怎样呢？东汉前期为建都洛阳或长安，曾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，杜笃、傅毅、崔駰、班固等等都为此而写作京都赋来表示自己的态度。须知写作京都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，张衡“研《京》（指写《二京赋》）以十年”，“左思练《都》（指写《三都赋》）以一纪”。写作京都赋是极其费时费力的，但杜笃们还是决意选择走这条路。由此可看出赋体文学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之一斑。至于东汉后期的情况，我们只要看一下汉灵帝对辞赋的特殊看重就足以说明问题了。汉灵帝为培养辞赋书画人才，鼓励人们创作辞赋书画，特设鸿门都学，广招学徒，生员多至千人。学成后即派他们到各州郡当刺

史、太守，或入为尚书、侍中、封侯赐爵，甚至“诏中尚方（属少府）为鸿都文学乐松、江览等三十二人图象立赞”。他的做法引起社会广泛反应，于是“诸生竞利，作者鼎沸”，人们纷纷加入辞赋书画创作中去。虽有蔡邕这样大学者大赋家极力反对，但其势是不可遏止的（以上参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五十七）。所以钟嵘在《诗品·总论》里说：“自王（褒）、扬（雄）、枚（乘）、马（司马相如）之徒，词赋竞爽，而吟咏（指写诗）靡闻。从李都尉（陵）迄班婕妤（姬），将百年间，有妇人焉，一人而已；诗人之风，顿已缺失。”东汉的情况也应当是这样。在整个两汉四百年间，写诗的人极少，作赋的人极多，两汉的文坛确为汉赋所垄断。这是文艺界的盛事，是发生于两汉崭新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新鲜事。从此，赋这种文体正式成立，我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之林也因而增添一种艳丽之花，这是很值得我们庆贺的。王国维对汉赋的评价是基本正确的，我们应给予充分的肯定。

三

两汉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崭新的时代，是第

一次出现真正统一、强大、文明、昌盛的时代。新时代诞生新文学。新文学又回过头来反映新时代。我们读汉赋，尤其是读其中那些有代表性的汉大赋，往往会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摇撼着我们的心灵，有一种欢快的上升的气氛在激励着我们的神经。这就是蕴涵在作品中的大汉帝国的统一、强大、文明和昌盛。这种情况在作品中是随处可见的。

说到大汉帝国创建的历程和大汉帝国的声威，赋家们多怀着一种未曾有过的喜悦、激动和自豪的心情来描述：

于是圣武（汉武帝）勃怒，爰整其旅。……遂猎乎王庭，……夫天兵四临，幽都先加；回戈邪指，南越相夷，靡节西征，羌僰东驰。……自上仁所不化，茂德所不馁，莫不趺足抗首，请献厥珍。使海内澹然，永无边城之灾，金革之患。

——扬雄《长杨赋》

武帝凭借文景以来积累的雄厚财富和本人的雄才大略，开始对外用兵，开拓疆土。经过五十多年的征战，付出了“海内虚耗，人口减半”的代价和各民族人民的巨大牺牲，终于为我们今天这个疆域辽阔、

多民族的伟大国家奠定了基础。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立有大功的一个皇帝。

西汉末年，王莽篡位。由于王莽的狂妄无端的举止，曾引起四周各族的骚动，边患又成为一个大问题；尤其是北匈奴，又成了汉家的劲敌。这种情况一直到东汉的明帝、和帝以后才有了根本的好转。公元89年（和帝永元元年），汉军分三路追击北匈奴，各路大军出塞三千余里，窦宪登燕然山（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）刻石颂汉功德而还。公元91年（永元三年），耿种、任尚率汉军西出张掖郡，去国五千里，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（在今俄国境内），这是自汉以来出师追击外敌最远的一次。这时班超经营西域也完全成功，西域五十余国全部内附，葱岭东西路通。对东北、西南、南方疆土的开拓，也有很大进展。各族人民和睦相处。这是中国继宣武以来又出现的一个盛世，班固在《两都赋》里以欢欣的心情高唱着：

于是……（天子）目中夏而布德，瞰四裔而抗棱，西荡河源，东澹海潏，北动幽崖，南耀朱垠。殊方别区，界绝而不邻。自孝武之所不征，孝宣之所未臣，莫不陆訾水慄，奔走而来宾，……是日也，天子受四海之图籍，膺万国之

贡珍；内抚诸夏，外绥百蛮。

类似这种发自内心的高昂欢快的颂词，在其他赋家的作品中也屡有出现，这是以往任何时候都未曾有过的。我们知道，中国在夏、商、周三代以前，或则系国家机构尚处在逐渐形成的阶段，或则天子仅充当有名无实的象征的角色；即使是最强盛的时期，王朝的统治范围也仅限于中原狭小地区。孔子的大统一思想，实未真正出现过。而且边患接连不断，“靡室靡家，玁狁之故；不遑启居，玁狁之故。”（《诗经·采薇》）这样的哀诉时续时断，连绵数千年。秦虽统一中国，但因时间太短，又多行暴戾，为人们所厌弃，而且实际统治区域也不能与汉相比。只有两汉，才真正一改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的积弱，旧貌换新颜，掀开了中国崭新的一页。面对这种崭新的局面，人们怎么能不大唱赞歌呢？这是时代的赞歌，是人们在崭新的生活环境中产生的崭新的思想感情的流露，是时代精神的大张扬。

这种激越的新时代自豪感我们甚至在作者描写都市、物产、建筑、杂技、音乐、狩猎等等各方面也可以感觉到。如班固写西都长安：“华实之毛，则九州之上腴焉；防御之阻，则天地之隩区焉。……封畿之

内，厥土千里，逴跖诸夏，兼其所有。其阳则……郊野之富，号为近蜀。其阴……下有郑白之沃，衣食之源，……西郊则有上囿禁苑，……其中乃有九真之麟，大宛之马，黄支之犀，条支之鸟，踰崑崙，越巨海，殊方异类，至于三万里，……”（《两都赋》）长安形势之优越险要，物产之富庶珍奇，贡物之名贵繁多，均居环宇之冠，真是一个堂堂大国的理想的首都，谁能比得上它呢！

扬雄笔下的甘泉宫，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。其通天台是：“直峣峣以造天兮，厥高庆而不可夫弥度。”其大厦是：“仰桥首以高视兮，目冥眴而亡见；正浏濫以弘惝兮，指东西之漫漫。”甘泉宫楼台宫馆，是高看不到顶，大望不到边，一句话，就是任何建筑物也不能超越，惟有它最高，惟有它最大。《史记·高祖本传》曾载，萧何营作未央宫，因过于奢侈而受到高祖的斥责，萧何回答说：“天子以四海为家，非壮丽无以重威，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。”这话庶几道出了汉人的心理特征，他们的所作所为，包括营建宫室在内，就是要做到“无令后世有以加也”。就是要做到空前绝后。萧何生活在汉初，实际上还很难做到这一点，只有武帝以后才可能做到。但萧何这种思想是有代表性的，是大汉帝国英雄人物思想的典型写照。

再看看司马相如《天子游猎赋》所写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歌舞演出：“（天子）于是乎游戏懈怠，置酒乎颢天之台，张乐乎胶葛之寓，撞千石之钟，立万石之虞，……千人倡，万人和，山陵为之震动，川谷为之荡波，……”场面是何等广阔，人物是何等众多，声势是何等雄壮。小国寡民何敢望其项？清静寡欲何能步其尘？

天子游猎的阵容呢？那是：“千乘雷起，万骑纷纭；元戎（兵车）竞野，戈鋌彗云；羽旄扫霓，旌旗拂天。焱焱炎炎，扬光飞文；吐燭生风，欲野歎山。日月为之夺明，丘陵为之摇震。”（班固《两都赋》）千骑万乘，震声雷动，旌旗如林，日月无光，天子外出时的队伍是何等的壮盛！何等威武！这不正是天朝大国的雄风吗？在枭雄割据，小国丛立，国力脆弱，民不聊生的混乱时代，是绝对写不出这样轰轰烈烈的场面的。

赋家们甚至在描写山形水势时，也表现出飞动的气势，呼唤着时代的心声。如司马相如笔下上林苑的河流：“荡荡乎八川分流，相背而异态，东西南北，驰骛往来。出乎椒丘之阙，行乎洲淤之浦，经乎桂林之中，过乎泱漭之野。汨乎混流，顺阿而下，赴隘陋之口，触穹石，激堆埼；沸乎暴怒，汹涌澎湃，……”整

个画面是那么流畅、欢快、强劲、壮美，飞腾的气息跃然纸上。所以，人们都可以极明显地看到，汉赋尽管是那样地堆砌、重复、拙笨、呆板，但是江山的雄伟、城市的兴盛、商业的发达、物产的丰饶、宫殿的宏伟、服饰的奢侈、鸟兽的珍奇、人物的气派、狩猎的惊险、歌舞的欢快，在赋中无不刻意描写，着意夸扬。它们所力图展示的，不正是一个繁荣富强、充满活力、自信和对现实具有浓厚兴趣、关注和爱好的世界图景吗？它表明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后，对世界的直接征服和胜利。所以汉代文艺尽管粗重笨拙，然而它却是如此之心胸开阔，气派雄沉，其根本道理就在这里。我们对汉赋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，才能正确估计它作为一代文学正宗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，才能纠正百年来对它的错误看法。赋家们着意描绘的汉代现实生活，并不是为描绘而描绘，也不是纯客观的描绘，所有这些描绘，都浸透着作者的美学理想，表现着大汉帝国的时代精神。

四

在封建社会，即使上升时期、黄金时期，也无可

避免地必然地存在着严重的黑暗面，文学艺术也有责任去暴露它。但汉赋在大力歌颂大汉帝国的同时，对社会黑暗面的暴露却大为逊色，这里，有三个原因：一是汉代处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，国家刚刚统一不久，阶级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，人们还多为大汉帝国的雄伟阔大欣欣向荣的气象所陶醉。二是与文学发展的突变阶段有关。这时的文学艺术正处在从儒家经典的附庸地位中解脱出来，而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的新阶段，因而要求充分发展自己的特点，也即要着重解决艺术形式问题，而对思想内容的要求则相对忽视。这一点后面还要讨论。三是与赋家的身份有关，大赋作家多是帝王的弄臣，生活在帝王的身边，他们所看到更多的是帝王的奢华和威风，感受到更深的是大汉帝国的文明和强盛。他们很难接触到下层人民的生活。即使看到了一些世间的平和和苦难，他们也不敢轻易说出，更不敢直言正色地进行抨击。但作为一个赋家，尤其作为一个比较正直的有良心的赋家，他们也不能闭眼塞听一味地阿谀奉迎，回避问题，他们必将有所指陈。他们必将根据自己的身份地位，根据自己的所闻所见，进行力所能及的讽谏，因而也就出现了在大赋作家的作品中多有微讽帝王的旨意在。

首先是讽谏帝王过分的骄奢淫逸。骄奢淫逸几乎是帝王的通病。“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”的身份地位使他们极易染上这种疾病。这种疾病又往往是他们的致命伤，历史上一些无道昏君如夏桀、殷纣、周厉王、周幽王等等的丧身失国，都与他们的骄奢淫逸有关。所以古代一些比较明智的帝王将相对此都很警惕，许多历史家、思想家对此也总是力加劝戒。如汉文帝刘恒，就是中国历史上以勤俭自持著名的皇帝：“孝文帝从代来，即位二十三年，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。有不便，辄弛以利民。尝欲作露台，召匠计之，直百金。上曰：‘百金中民十家之产，吾奉先帝宫室，常恐羞之，何以台为？’上常衣绨衣。所幸慎夫人，令衣不得曳地，帟帐不得文绣，以示敦朴，为天下先。治霸陵，皆以瓦器，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。不治坟，欲为省，毋烦民。”（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）对于这样一个至为重要、具有普遍意义的古老的历史主题，汉赋作家也时时注视着，并根据现实生活有针对性地进行再创作。

这一点我们在西汉前期大赋形成阶段的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到了，只不过还没有像后来扬雄赋那样在序里公开提出就是了。其中涉及这个问题最著名的赋作有枚乘的《七发》和司马相如的《天子游猎赋》。在

《七发》里，作者写了楚太子有病，症状是：“肤色靡曼，四支委随，筋骨挺解，血脉淫濯，手足堕窳。”病因一方面是物质生活过于侈靡，而另一方面又缺乏健康的精神食粮：“今夫贵人之子（当然也包括楚太子），必官居而闺处，……欲交无所。饮食则温淳甘腴，脍醢肥厚，衣裳则杂遝曼煖，燁烁热暑。”怎么医治呢，吴客提出了六种治疗方法——听乐、甘食、乘骑、游览、田猎、观涛，但都未能奏效。最后吴客提出请博学而有理论有才智的人，讲解“要言妙道”——“论天下之精微，理万物之是非”，楚太子听到了这样说，就好像听了圣人辩士的高论一样：“潏然汗出，霍然病已”，出了一身大汗，病忽然间就好了。

对于这篇赋（七体是赋的一种形式）的看法，历来分歧很大，刘勰说：“盖七窍所发，发乎嗜欲，始邪末正，所以戒膏粱之子也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杂文》）《文选》李善注则说：“乘事梁孝王，恐梁王反，故作《七发》以谏之。”我以为此赋的思想是很丰富的，是具有多层次的，其中当然也包括反对帝王的糜烂生活。因为赋说得非常清楚，楚太子患病，就是由于他沉湎于荒淫奢侈的生活当中。而一旦脱离了这种生活环境，听到“要言妙道”，病就好了。